



英藏黑水城文献 Or8212/1343 号脉法残片考

——兼论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的互串问题

惠 宏

—

英藏黑水城文献 Or8212/1343 号脉法残片亦编号为 S.碎.181，马继兴先生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一书中全文辑录，拟题为“不知名脉法残片”。据马先生介绍，此残片原缺书名及撰人，首尾上下均残脱，仅存四行残文，英国国家图书馆将其与其他残卷碎片合裱于一纸。残文据马先生辑录转抄如下（按，[]中的文字原脱，为马先生据《难经·二难》所补）：

- 1 口浮寸脉不下口
- 2 口尺脉上下不口
- 3 口[阳]得寸内九[分]口
- 4 口阴得尺内一寸取口

据马先生考察，此残片的第三、第四两行残文均可见于《难经·二难》及刘叔和《脉经》卷一《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第四》一篇中，排列顺序又与以上二书前后颠倒。且第一、二行之文不见于以上二书，足证此残片所记属于摘引自古书之言。^①

据笔者进一步考察，这一脉法残片并非完全没有出处，抛开马先生个别地方辑录错误之外，实际上它与《普济方》卷一百二十六《伤寒门·平脉法第二》中一段文字完全吻合。为方便比对，将《普济方》相关的原文摘抄句读如下（与残片吻合部分加点号表示）：

夫三部之位，左右手去鱼际一寸，名曰寸口；去尺泽一尺，名曰尺部。两境之间，名曰关，位六分，阳部出三分，阴部入三分。关前为阳，关后为阴，为阴阳之关津。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阳得寸内九分，取阳奇之数；阴得尺内一寸，取阴偶之数。是名关尺也。寸上一分为鱼际，关上一分为神门，左关为人迎，右关为气口，三阳从地长，故男子尺脉常沉。……^②

《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橚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

① 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5-165。

② [明]朱橚：《普济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

执笔汇编而成，刊于永乐四年(公元 1406 年)。该书广泛辑集明以前的医籍和其他有关著作分类整理而成。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 19 卷，明抄本存 35 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

《普济方》成书于公元 1406 年，这与黑水城出土的文献在时间上不吻合。黑水城在元代及北元政权时期为亦集乃路，公元 1372 年(明洪武五年，北元宣光二年)，明军由征西将军冯胜率领“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①。其后，明军并未在此驻扎统治。目前，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晚文书为北元宣光二年(1372 年)。黑水城文献的下限一般都认为在这一时期。这样看来，黑水城出土的这一脉法残片应该是早于《普济方》的另外一种医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是书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櫛自订定。……然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今散佚十之七八，櫛当明之初造，旧籍多存……是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②看来，与黑水城出土脉法残片相同的《普济方》之《伤寒门·平脉法》应该是今天已经散佚的宋、元或更早时期的某种医籍文献内容之一，遗憾的是，与大多数方剂注明出处不同，《普济方》在《伤寒门》内容中，均未有出处说明，我们暂时无从判断这个佚失的医籍到底叫什么。因此，这一出土残片不妨暂拟名为“伤寒门·平脉法残片”。

二

值得一提的是，郭锋先生在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中也辑录了一脉法残片^③，将其转抄如下：

[前 缺]

1 口津寸脉下不口

2 口大(?)脉上不口关口

3 口得寸内九口

4 口阴得尺内一寸取口 [后 缺]

此残片编号为 Or8212/1343 KK0121 dd，根据郭先生在书前凡例中的介绍，编号中的 Or8212/1343 为大英图书馆东方部馆藏编号，KK 表示出自黑城子的编号。

尽管二者的编号不同，辑录的文本个别地方也存在差异，仍有理由相信，二者实则辑录自同一残片。两个文本的文字差别可能源于原残片文字漫漶不清，但几行文字的排列顺序却惊人的相同，而这种排列顺序又十分罕见，况且它们同辑录自大英图书馆，同为斯坦因所获，怎么可能有如此雷同的两个抄写残片存在呢？编号的不同则是前者采用了斯坦因的编号，后者采用了东方部的馆藏编号。

至此可以明白，马先生将这一脉法残片视为敦煌医药文献进行辑校，有失妥当。这实则是斯坦因 1913 年第三次中亚探险从内蒙古额吉纳旗的西夏古城——黑水城所获的文书之一，是为英藏黑水城文献。最近出版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公布了这一残片的影件，仍拟题为“脉法残片”，并对这一残片内容进行了著录^④。新著录较上述录文更胜一筹，仅有一处错误。

① [清]张廷玉：《明史》卷 129《冯胜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年

②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873 页。

③ 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60 页。

④ 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143 页。

黑水城文献串为敦煌文献的情况非此一例。早在 1992 年,方广錫先生在《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一文中考证出俄藏 F. 221+F. 228+F. 266《大乘入藏录》为黑城出土物,而在此前这一文献被 J. -P. Drege 在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一书 (Paris 1991) 中是用来讨论敦煌藏经的。^①1994 年,荣新江先生亦考证出,《俄藏敦煌文献》第 4 册所收的 F. 229+F. 241《景德传灯录》也是出自黑水城。而这件藏品曾被当作敦煌藏经洞最晚的写本对待。^②1995 年,方广錫先生再一次指出密教典籍《八种粗重犯堕》,亦是俄藏黑城出土但混入敦煌写本,现编号 Φ. 221,并认为是西夏文献。^③此后,荣新江先生进一步指出,《俄藏敦煌文献》前五册所收 F. 214 天庆丙辰(1196)写《亲诵仪》、F. 311 皇庆二年(1211)写《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是黑城出西夏佛典无疑;而 F. 123A、F. 204A、F. 308、F. 360、F. 317、F. 335、F. 337 等刻本佛像和佛经,大多也不是敦煌藏经洞所出,其中 F. 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有北宋元丰六年(1083)题记。^④类似混入敦煌写本的黑水城文献还有:

《俄藏敦煌文献》第 5 册所收的 Φ335 号,此件原拟题为“佛经供养偈”,后经宗舜法师研究实为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善生王品第二十一”中的内容。当改拟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残页”。《俄藏敦煌文献》10 册所收的 Д x 02823 号,此件原拟题为“佛教名词问答”,亦经宗舜法师研究为唐/李师政所撰的《法门名义集》中的内容。当改拟为“法门名义集”。^⑤

此外,《俄藏敦煌文献》所收的 ДХ. 190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X. 18992《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防贼禁约令》这些亦集乃路文书更应是黑水城出土文献无疑。^⑥

随着敦煌以外地区出土、而曾被视为敦煌所出的文献一件一件被甄别出来,敦煌文献的辨伪问题日为敦煌学界重视,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则专门别出一章来讲这一问题。

不过,这一问题应当区分两种情况:一是确为敦煌以外(如黑水城)所出,而串入敦煌文献,二是本为敦煌所出但非藏经洞物品。第一种情况的确定,当求得充分的证据。如本文考证的 Or8212/1343 号脉法残片有明确的 KK 编号;再如上文所提的俄藏《景德传灯录》,在英藏斯坦因所获黑城文献中可求得充分证据,即编号为 Or8212/1343 KK. II. 0238 (k) 的写本照片,正面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九二,背面为《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字体、形制与俄藏本完全相同,系同卷散出的一叶。

第二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流入俄方的敦煌文献主要由奥登堡于 1914-1915 年从敦煌收集带走的。据记载,他曾经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对莫高窟北区石窟都作了考古清理,第一次绘制了莫高窟南北二区的崖面平面图。所以他的收藏品除了来自在当地收购的文物文献之外,可能有一部分是从莫高窟北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⑦最近,对北区石窟的清理仍可以发现不少的西夏文物文献,也可以推知奥登堡藏品中有西夏纪年的物品当不足奇怪。

① 方广錫:《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 年第 1 期。

② 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第 250-253 页。

③ 方广錫:《八种粗重犯堕》,载《藏外佛教文献(一)》,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

④ 荣新江:《〈藏外佛教文献(一)〉评介》,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⑤ 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⑥ 金滢坤:《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⑦ 沙武田:《俄藏敦煌艺术品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关系蠡测》,《敦煌学辑刊》2004 年第 2 期。

重要的是,在利用这些材料时要“小心谨慎,不可以非敦煌的材料来讨论敦煌的某些问题,也不应忽视这些非敦煌资料在研究高昌、于阗、西夏等问题时的重要价值。”^①更不应忽视看似非敦煌资料实则敦煌出土材料在讨论敦煌及研究西夏等问题时的重要价值。

黑水城文献中也同样存在着混入敦煌遗书的问题。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有以下几种:

TK157 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残页(见《俄藏黑水城文献》384 页)

TK188 妙法莲华经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残页(见《俄藏黑水城文献》190 页)

TK283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供养文(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④》页)

TK288 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像供养文(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④》377 页)

TK289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供养文(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④》378 页)

TK317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卅八题签(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④》13 页)

TK325 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第十四(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④》89 页)

B54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⑥》页)

B56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⑥》28 页)

B55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⑥》18 页)

B57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残页(见《俄藏黑水城文献》⑥41 页)

以上文献多为唐写本或五代刻本,在《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叙录》中已经指出为敦煌遗书。这些文献是否都是混入的敦煌遗书呢?是否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即这些文献本是黑水城所出,系由西夏、蒙元时期或在此以前由敦煌或河西地区传入的呢?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例如,上文的 B54、B55、B56、B57 根据其文献的基本特征来看,毫无疑问是同一写本。但是 B55 的“破损处糊着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方块纸(当时的裱褙)”。^②B57 写本前竟印有一副西夏(1189 年 4 月 2 日)刻华严三圣版画。^{③[14][p110]}既然有裱糊西夏文字与西夏版画,可以肯定它不是敦煌藏经洞所出。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奥登堡从敦煌石窟北区所发掘而带入俄国,二是它原本就是黑水城所出,是西夏、蒙元时期或此前由敦煌或河西地区传入。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情况,因为,奥登堡是否真的从敦煌石窟北区发掘并带走了一批文物,还没有人拿出有十分把握的确凿证据,而且最近在敦煌石窟北区所发掘的文献还未见保存如此完整的文献样式。

因此,在利用黑水城文献材料时,同样要十分谨慎,不可以以非黑水城文献的材料来讨论西夏和蒙元时期的问题,也不应忽视混入其中的敦煌文献材料在讨论敦煌相关的问题。如果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果真含有唐写本或五代刻本,就更应该注意到西夏前代的文献写本和刻本在西夏的流传以及对西夏书籍出版乃至文化交流的影响。

黑水城文献中混入的敦煌文献以及敦煌文献中混入的黑水城文献的甄别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随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可能还会有许多预想不到的结论和观点产生。

(作者通信地址:宁夏医学院中医学院 银川 750021)

① 荣新江:《〈藏外佛教文献(一)〉评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②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10 页。

③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10 页。